

管理导向的“摇摆”与实践边界的“迷思”： 广播电视新闻主播的角色调适研究

张世轩^{1,3}, 张志安², 钟棣冰¹

(1.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207; 2.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3.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第1眼新闻, 重庆 400012)

摘要: 随着新媒体对传统新闻业态与视听传播格局的冲击加剧, 广播电视新闻主播群体面临职业认同重塑与职业角色调适的多重挑战。文章基于对15位在职广电新闻主播的深度访谈, 探讨机构定位和实践边界的调整对新闻主播角色调适的影响。研究发现: 新传播语境重构了新闻主播的职业场景和原有的言说样态, 重塑后的新闻主播形成了官方属性与个性表达相糅合的言说方式; 传统广电媒体固有的“喉舌”角色认知与资本积累, 共同形塑了主播象征性资本转化的调适策略; 主流媒体不明晰的角色定位、组织“摇摆”的管理导向以及对相关实践边界的模糊规则, 使主播面临着机构角色定位与自身实践边界的“双重迷思”。新闻主播的新媒体实践更多依靠个体层面的探索与试错, 导致最终角色调适、转型效果不佳。

关键词: 新闻主播; 角色调适; 媒体融合; 职业认同

中图分类号: G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4) 06-0049-09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深刻嵌入新闻行业, 重塑了新闻的生产流程、传播和消费模式, 改变了传统媒体发展格局和媒介生态。从早期的计算机, 到移动手机、传感器、智能家居设备等智能终端, 再到算法、应用软件等各类软性机器, 智能技术正广泛应用于内容生产端、传播渠道和用户端。^[1] 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深刻渗透、嵌入新闻行业, 重塑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范式, 并在一系列媒体实践中引发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知剧变, 传统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转型与角色调适逐渐成为学界与业界广泛关注的核心议题。

伴随广播电视媒体兴起而逐渐发展壮大的新闻主播群体, 长期以来以“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根本定位, 通过播音主持实践带来的叙事权力, 不断建构自身职业权威, 形成了阐释共同体, 并在播音主持专业学习、广电媒体职业准入、专业评奖评优、播音主持职称晋升路径、主持人品牌化建构、社会影响力提升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职业闭环。以时政新闻播报为主业、以喉舌功能为显著特征的新闻主播群体, 不仅要面对广电媒体融合进程中, 组织内部调整对自身职业边界的重构, 还要面对平台媒体兴起后, 各类“网红主播”进一步分流注意力资源、智能技术助力下AI主播不断冲击业务职能的挑战。当新闻主播群体面对职业身份“去魅”^[2] 而造成的认知焦虑及现实困境时, 重新思考新闻主播群体的职业转型与角色调适, 进而从根本上探讨广播电视媒体如何实现媒体深度融合尤为重要。目前, 有关新闻主播群体的职业认同困境、职业生涯转型与角色调适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极少, 相关研究更多从宏观层面进行思辨, 缺乏对一线新闻主播转型与调适实践的细致考察, 这也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出发点。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媒体对新闻真实性的挑战与治理”(23&ZD213)。

作者简介: 张世轩, 男, 播音指导, 博士研究生; 张志安,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钟棣冰, 男, 博士研究生。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转型与角色调适

随着传统媒体的职业权威、行业垄断地位受到冲击,包括广电在内的传统媒体普遍选择媒体融合战略作为自身的核心变革举措。在此背景下,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转型与角色调适便成为必然之举,不过从业者的职业转型与角色调适道路并非一帆风顺。^[3]当下,记者的职业地位在社会中伴随传统媒体的式微而急剧下降,直接体现在新闻从业者离职甚至转行数量持续增加,^[4]反映出新闻从业者普遍面临着深刻的职业认同与角色冲突危机。^[5]

一些研究将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遭遇的现实境遇主要归因于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冲击。^[6]实际上,个体、传媒组织、受众(用户)、竞争者、政府、技术、资本等因素均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危机存在复杂关联。其中,媒体融合背景下技术、行业监管、商业资本等三重力量,使得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问题变得更加严峻。^[7]可见,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危机,既不是从业者个体的职业发展问题,也不能单纯归咎于新技术带来的冲击,而是深根于宏观社会体制与媒体融合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业者所面临的自我认知、角色冲突与职业认同危机。

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有关传统媒体从业者角色调适与职业转型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媒体从业者的离职行为,有关从业者内部转型与角色调适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国外研究更多探讨媒体从业者离职的行为特征及其原因。^{[8][9]}国内研究还划分出媒体人的离职行为类型。^[10]学者张静认为,相对于离职这一特殊的转型行为,媒体人内部转型现象更加普遍,且对于媒体机构的融合发展而言更加关键。通过组织认同—变革承诺的二维框架,她将传统媒体人的转型态度划分为主动型积极转型、被动型积极转型、消极转型、转型逸出型和转型倦怠型五种类型。^[11]

也有部分研究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知转型与角色调适实践进行“深描”^[12]:面对新技术的不断冲击,新闻从业者普遍经历着“一心一用与一心多用、专业与全能、深度与速度、把关与流量”的矛盾,^[13]从而深刻形塑了新闻从业者身份“泛认同”的职业新认知。新闻从业者试图在他们的日常新闻工作与他们对拥有新闻专业知识的要求之间建立关系,特别是在面对行业内外的挑战时,通过不断反思和自省来构筑适当的新闻边界,这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14]朱江丽等进一步聚焦以“角色融合”为代表的角色调适实践,提出“专业角色”是新闻从业者角色融合实践的根本,提高从业者“专业角色”认同成为未来媒体融合实践的关键。^[8]

以上研究为理解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调适与职业转型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阐释,但以往研究聚焦的大多是记者、编辑或主流媒体的管理人员,作为从业者重要构成且具有媒体品牌代言功能的新闻主播群体,则处在研究对象的“边缘地带”。新闻播报在传统新闻生产流程中,介于新闻生产与收受的中间环节,受到新媒体技术的冲击相对较少,因此过往研究甚少关注新闻主播群体的角色调适与职业转型实践。平台媒体兴起后,各类“网红主播”崛起导致注意力分流,同时以AI主播为代表的智能技术逐渐承担起主持与播报等任务,开始影响传统上认为主播是人类特有职业的认知观念,对职业新闻主播带来极大的冲击。

（二）职业新闻主播的职业转型与角色调适

随着社交网络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非职业群体的涌入,主播的专业价值受到挑战。随着传播的下沉和去中心化,周勇等学者认为,主播群体经历了从传媒机构的被动安排,到由受众的主动塑造,再到受众自我表达的三个阶段,^[15]并在更直接的社会互动和“正式”与“非正式”的身份转换中寻求认同。^[16]究其根源,在于新技术颠覆了原有的传播模式,固有的传播关系也随之改变。新媒体时代的传播不仅仅是传播者向受传者传递信息的单向过程,而是具有信息交流的双向性质。传播者、受

传者总是处在互动之中, 其中包含着多重互动关系。^[17] 因此, 现有职业新闻主播的角色调适与职业转型研究, 大多数基于这一传播关系, 聚焦于宏观思辨和实务应用层面提出相应对策。

具体来看, 有学者提出, 主播的传播策略需要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呈现出新的传播角色定位, 具备信息整合传播的能力以及与受众互动传播的能力。^[18] 新闻主播需要实现从信息传递者转型为多向沟通者, 从内容传达者转型为内容的有机组织者, 从信息告知者转型为观众的陪伴者, 从播音主持专业人才转型为多种艺术、技术复合型人才的多维度角色转型。^[19] 当下, 由于新媒体打破时空的界限, 使主播的新闻传播活动不但呈现表达的长效化, 还可以作为其他领域的权威资讯进而引导舆论。^[20] 对此, 有研究认为融媒时代主播的角色转型需要更加注重接受主体的多元诉求, 用贴近用户思维的内容、嵌合社会环境的文本, 适时反映社会文化的变化图谱, 努力成为有效联系观众(用户)与媒体、媒体与社会的情感纽带。^[21] 一些知名网络主播也凭借自身积累的影响力与公众形象进入传统媒体, 网络主播与职业新闻主播的角色身份与功能处于相互影响与重塑的过程当中。^[22]

面对组织内外部重构和冲击, 新闻主播如何对自己的角色定位进行调适、转型, 这将是社交平台逻辑、智能技术逻辑带给媒体逻辑的最新挑战。^[23] 现有文献大部分新闻从业者角色调适与职业转型的研究大多聚焦在记者、编辑群体, 少量关于职业新闻主播的角色调适更多基于宏观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鲜有实证研究深入一线新闻主播内部的角色调适、新闻实践及其复杂情境。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广电新闻主播群体如何认知主播角色, 并如何在播音实践中进行角色调适? 这种角色调适如何受到广电媒体组织机构的影响? 主播群体的角色调适是否能够解决职业认同的困境? 这从根本上反映出传统媒体融合进程中的何种困境?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基于研究问题, 本文选择质性研究路径, 通过对新闻主播群体进行深度访谈获得一手资料, 以全国范围内具有从业资质的广播电视新闻主播作为研究对象, 即从事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播音的专业人员, 包括从事演播室出境播音、新闻配音、新闻现场出境报道等工作的人员。在抽样方法上,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 在组织和个体(从业者)两个层面尽可能保证访谈对象的异质性。在机构级别上, 访谈者涵盖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台。具体而言, 中央级媒体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体育频道、CGTN英语频道、农业农村频道。地方卫视受访者则来自我国不同地域: 吉林卫视(北部)、北京卫视(北部)、东方卫视(东部)、厦门卫视(东部)、深圳卫视(南部)、重庆卫视(西部)、四川卫视(西部)等。此外, 鉴于已有研究发现广播电视新闻主播的从业年限和新媒体卷入程度(是否具有新媒体实践)^[7]会影响其职业认同水平, 本文将从从业年限和新媒体参与度作为重要的抽样依据, 最终共获取15位在职新闻主播作为受访对象。访谈对象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本研究访谈时间为2023年8月至2023年9月, 主要采用线上语音访谈的方式进行数据搜集。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方式, 并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访谈时长在51—77分钟之间, 并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二次访谈。当访谈进行到第15位时, 受访者提供的见解不再具有新意, 可以认为数据资料达到饱和。^[24] 访谈结束之后, 本文将所有的访谈录音转录为近14万字的原始文本。随后运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2, 通过三级编码对原始文本资料进行分析。一级编码阶段, 首先对原始文本进行逐句、逐段赋予概念。随后根据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 将相似的概念聚合为更加抽象的范畴。在此过程中, 对于赋予初始概念的语句和段落, 只有出现两个或以上联系紧密的概念时才将其聚合为同一个范畴。二级编码阶段通过分析比较各个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涵, 将范畴归纳为主范畴。最后对二级编码产生的主范畴进一步深度挖掘, 提炼出能够引领所有范畴的核心范畴。此外, 本文在处理数据时, 出于研究伦理和受访者隐私考量, 对访谈对象进行匿名化处理, 用A1—A15进行代替。

表 1 受访广播电视新闻主播基本信息表

受访者	媒体类型	从业年限
A1	省级台	15 年
A2	省级台	10 年
A3	中央台	20 年
A4	省级台	8 年
A5	中央台	19 年
A6	省级台	12 年
A7	中央台	13 年
A8	省级台	9 年
A9	中央台	7 年
A10	中央台	14 年
A11	省级台	1 年
A12	省级台	3 年
A13	省级台	1 年
A14	省级台	2 年
A15	省级台	2 年

三、研究发现

（一）媒介场景转换：言说样态与表达方式面临解构压力

进入到融合传播时代，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角色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25]这主要是源于新媒体传播语境改变了新闻主播的职业场景和原有的言说样态，移动互联网技术打破了时空距离和障碍，使得受众在私人场域就能实现传播场景共在和共享。具体到本研究而言，不少受访者表示互联网新媒体与传统广电媒体的底层逻辑有着明显的不同：广播电视媒体是多工种配合的专业化团队进行节目内容制作，新闻主播作为整个新闻生产流程的最后一环，利用现代视听媒介的手段去观察、理解、取舍和叙述现实，重塑媒介现实。但是，当前平台媒体碎片化的视频制作方式彻底解构了广播电视线性传播模式，这种传播场景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主播语言表达形式和思维方式的全面解构。

对于新闻主播来说，规范标准的普通话发音特点代表了一个区分性的语音体系，体现国家通用语的象征性权威，电视新闻播音稿件中的词语是被仪式化了的表达形式，它们暗示了一种被社会认可的力量，通过施加某种对社会世界的看法、某种分类来进行合法观念的输出。传统电视新闻播音语言的特点是规范性、庄重性、仪式性。受访者普遍表示，大屏端播音主持要求具备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语言思维，必须将新闻事件完整全面地表达清楚，但是新媒体语言表达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A5 说：“网红主播甚至没有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哪怕普通话不标准的人他都可以获取到受众喜爱，只要他的内容真正受到欢迎。”

作为一种符码（cipher），言说的最大价值在于使声音与意义之间建立起等价关系，广播电视媒介

作为一套规范系统调节着新闻主播的语言实践。但在新媒体环境下, 语言的价值已经不再由主流媒体主播来衡量。A7说: “新媒体时代可能更加注重人格化, 需要主播们能够让网友看到自己的人格魅力不像以前在大屏所谓端着。”因此, 在分众化传播背景下, 新闻主播群体不再满足于主流媒体权威声音的“传递者”“宣传者”角色, 而是试图在分众化传播的新媒体场域中发挥主播个性化特点, 通过言说方式与表达语态的改变来实现一种角色调适, 其调适之后的言说是官方性与民间性表达的糅合, 试图以更加“接地气”的语言表达吸引受众。A3说: “观众对于主持人或主播的期待无外乎就是信息和观点这两个面相。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都穿着便装, 话题相对来讲都很软性, 把一些宏大叙事的话题微小化、轻量化。”新闻主播的语态变化本质上源于融合媒体语境下, 传统传播场景和传受关系被颠覆性重塑, 这也给新闻主播的身份认知与职业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 媒介身份重塑: 喉舌认知与象征资本转化存在焦虑

在传统大众媒体时代, 专业新闻生产高度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而广播电视媒介最大的传播特点便是能够超越此地此刻, 通过光纤卫星通信技术跨越不同日常生活的场域, 以视听符号的形式将其整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新闻报道。广播电视视听语言将人们共享的体验客观化, 为受众的主观理解提供秩序, 并为日常生活实际出现的不同意义提供主流价值层次的整合, 新闻工作者和电视观众在象征性意义的节目中得到合法化的身份认同, 社会生活中的主观现实有赖于大众媒体的可信结构, 不断生成稳定的秩序。实际上, 语言的运用方式与其话语的内容一样, 取决于言说者的社会地位。在我国媒介制度环境下, 传统媒体的“喉舌”地位决定了言说者使用制度语言, 即官方的、正统的、合法的话语工具。在访谈过程中, 受访者对新闻主播“党和政府的喉舌”定位有着清晰的认知。正是这种使用合法表达工具的机会, 以及因此产生的对于制度权威的参与, 制造了不能简化的话语差别。因此, 广电媒体新闻主播认为自身与新媒体网络主播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位和职责。

传统媒体既有优势式微、行业声誉下降迫使主播群体倒逼自身不断重塑职业身份。在传统主播职业生发出的“精英”想象, 伴随草根、网红主播的迅猛发展而不断消解的背景下, 部分受访新闻主播通过探索新媒体平台, 实现更进一步的角色调适, 但是“试水”新媒体场域过程中, 受访者大多对新闻主播职业角色存在两个层面的认知困惑。

一方面, 在职业角色认知层面上, 科班出身的新闻主播长期接受的职业教育与知识浸润所形塑的强烈“喉舌”认同, 为他们赋予了神圣的职业“光环”, 使其仍然对于自身的职业角色充满“自信”, 自觉地与互联网“网红主播”形成认知区隔, 并且坚信网络主播完全不能与官方背景的新闻主播相提并论。A10说: “新闻主播最不一样的就是, 我能把大政方针政策用最通俗的语言给你解读好。这就是不可替代的优势所在, 要不然你让那些网红主播来解读一个试试。”在这种光环的加持和对专业价值不可替代性的体认下, 部分主播并不会完全放下固有“身段”进入到新媒体平台。A2说: “科班出身做新媒体其实是降维打击, 只不过我们这些传统媒体的人可能还没有完全转变观念或者说没有放下身段去完全投入新媒体当中。”另一方面, 即便在相应新媒体平台上开设账号的新闻主播, 对于实际工作中的职业边界(从事何种方面的内容生产)也产生了认知困惑, 其中A3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对于新闻主播的角色定位其实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困惑, 既没有延续我们传统播音的二度创作那样一个路径, 同时我们也没有完全像西方那样给你更多的自由表达的空间, 所以我们的边界感并不是很强。”

这些新闻主播群体在试水新媒体播音实践过程中, 并没有完全割裂原有平台的职业角色特征, 而是采取了一种象征性资本的能动性转化策略。象征性资本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他认为语言这样一种符号表征承载了相应的社会权力关系, 成为“象征性的符号暴力”, “语言

关系即符号权力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转而以一种变形的形式表现出来”^[26]。语言作为符号象征对社会权力的表征，体现着不同社会成员的等级地位、相互之间的关系。在传统媒体时代，演播室场景借助电视媒介技术手段为时政新闻节目所需的重大时政新闻发布平台的定位提供物理支持，并在仪式化的语言表达中将主流媒体的权威象征化。新闻主播作为一个被授权的发言人，其“言说”同样具有与广播电视机构相一致的权威。因此，象征性资本既包括主播所在媒体机构的行政权威，也包括主播个体的影响力和美誉度。象征性资本的转化即指职业新闻主播将广播电视主流媒体的权威以及自身积累的原有职业声望“嫁接”到新媒体平台中发挥个人的专业价值，以此实现传播效应的整体增效。例如，受访者A5作为在传统媒体上具有一定权威性、影响力的主播，通过在新媒体上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利用自身工作经验发挥专长，深耕垂类（旅游）领域，在打破固有职业身份认知、实现新的媒介市场身份认同后，实现自身的专业价值。这种象征性资本的转化也成为受访新闻主播在角色调适过程中的主要策略。但总体上，这样的案例在本研究中只是少数，大部分受访者在探索过程中对于实践边界的把握仍然处于摸索、探寻的不明晰阶段，导致主播群体的角色调适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不确定状态，其转型实践的权益归属问题也处于模糊地带。

（三）媒介组织规约：机构定位与实践边界的双重困惑

职业主播角色身份调适、实践边界的把握困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电媒体机构自身不清晰的角色定位。广播电视台作为职业新闻主播群体的直接管理组织，如何认识和使用主播，并在新媒体传播中不断发挥主持人的社会文化角色至关重要。研究者通过访谈得知，面对网络视听新样态对传统广电媒体传播格局的冲击，媒介组织在新闻主播新媒体传播实践方面仍处于管理的“灰色”地带。这种不明晰、模糊的状态给包括新闻主播群体在内的传统媒体新闻工作者的融合传播实践带来不少困扰。通过本研究受访者的讲述，可以将广播电视媒体机构的新媒体实践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仍然固守于传统媒体业务范畴的“保守派”。例如受访者A15所在的省级电视台对于新闻主播的新媒体实践存在较多限制，任何台里主播的内容发布都会“受到严格管束与监视”，新媒体实践更多依靠主播个体进入平台，开设相应自媒体账号。相比较之下，第二类的机构则相对温和，在以传统电视端为主的基础上，部分将新媒体的运营实践纳入组织的业务范畴当中。例如受访者A12提到，尽管她每月都需要完成台里的绩效考核指标——发布15条短视频，但她表示：“虽然（台里）让我们一定要去重视新媒体，但还是说我们的主业是电视端，一定不要让新媒体端超过电视端。”这一部分的广播电视媒体机构呈现出部分学者所说的“姿态性媒体融合”^[27]状态，仅在形式上按照媒体融合要求，建设平台等硬件设置，但其组织结构、体制机制、思维模式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上述两种类型的广电机构侧面反映出媒体人，尤其是组织管理层面的认知、理念、态度等复杂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主播个体的调适转型实践，也直接影响传统媒体机构实现深度媒体融合的最终结果。

受访者所在的广电媒体还存在第三类积极探索派，即对于个体主播的新媒体探索秉持鼓励的正面态度。但意外的是，在这部分媒体组织赋予主播适度的新媒体探索空间前提下，受访主播表示自己仍然存在相应的实践边界困惑。体制机制上的屏障破除，并不能充分调和相关矛盾。究其原因在于，尽管有不少受访新闻主播提到自己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卷入到新媒体实践当中，但这更多是基于自身兴趣爱好选择不同类型的内容生产，广播电视台虽然对其新媒体实践持有或默许或鼓励的态度，但基本上没有为他们从事新媒体传播提供实质性的保障（如专业团队、硬件基础设施等人力、物力资源）。A4说：“台里对于主持人开账号是以鼓励为主，但也没有实质性的培育和孵化，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跟自己专业相结合的，比如说在抖音上发一些播音知识。”这种个体“单打独斗”的结果就是流量效益往往

不尽如人意。广播电视机构针对新闻主播群体进行新媒体端的内容实践没有出台明文规定, 这种规则不明晰的状态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疫情期间, A1 在台里播报新闻节目间隙利用演播室录制了22个视频作品发布在抖音平台, “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我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居然很有意义, 我觉得挺有成就感, 也挺荣光的。”而与A1皆来自省级电视台的A8, 则告诉研究者其所在的电视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后, 最终选择“不允许我们去以电视台的名义或者是以新闻主播的身份去做新媒体”。

可见, 广电机构既希望借助新闻主播的职业影响力, 通过新媒体传播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又担心新媒体舆情极化从而对新闻主播群体采取严格管理措施。这种“摇摆”的管理导向, 给新闻主播群体在从事新媒体内容实践时, 带来边界把握的挑战。对此, 职业新闻主播群体往往只能诉诸自我规约来趋利避害: 一方面, 新闻主播基于对自身职业特殊性(党和政府的“喉舌”)的认知, 并不轻易在新媒体平台尝试时政类节目。A2说: “我觉得新闻主播这个职业有一定的特殊性, 因为做时政新闻一些宣传上的口径完全是由自己做新媒体来操控的话是有一定难度或者说是有一定风险的。”另一方面, 即便是在短视频平台尝试新闻评论类的新闻主播, 也保持清醒的“边界”意识, 即坚守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安全与价值观取向, 时刻避免触碰“红线”。A7说: “理性一直是站在最上风, 一个新闻事件出来之后你该不该说话说什么, 这可能是要严格考量之后才会去做的。”面对这种边界困境, 部分新闻主播即便在所供职的电视台鼓励新媒体实践的情况下, 仍然选择放弃尝试新媒体平台, 固守于传统媒体机构拒绝角色转换, 最终导致调适效果不佳。

综上所述, 新闻主播群体的实践边界仍然处于不断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进程当中。这种动态调适的不确定性与其说是主播的职业角色认知尚不稳定, 不如说是由于广电媒体机构自身在融合实践过程中尚未找到清晰的角色定位, 以及对于新媒体实践的“摇摆”管理导向, 共同导致新闻主播群体的角色调适充满不确定性。学者宋江丽等曾提出, 我国新闻从业者面临着“专业角色”“事业单位”制度下的“职员角色”以及“企业管理”下的“职业角色”之间的激烈竞争。^[8]为此, 需要强化新闻从业者“专业角色”属性、赋予其适度探索新媒体的实践空间。实践过程中, 专业角色的强化并不足以调和相关矛盾, 职业新闻主播群体的角色调适需呈现合适的“角色”身份、把握恰当的实践边界。动态探索过程中角色调适不明晰, 本质上与广电媒体机构在媒体融合进程中尚未明确清晰的角色定位有着紧密联系, 表现在组织“摇摆”的管理导向以及对相关实践边界缺乏明文规定。新媒体实践更多依靠主播个体自身去探索、试错, 新闻主播群体在面临机构角色定位与自身实践边界的“双重迷思”时, 更多只能诉诸自我规约以避免触碰“红线”。

四、结论与讨论

相比较于大部分聚焦于记者、编辑群体的从业者角色调适、职业转型研究, 本文作为少量关于职业新闻主播角色调适的实证研究通过主播个体的微观视角, 对其角色调适、转型实践进行“深描”, 可成为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从业者转型研究的有益补充。本文发现, 新闻主播角色和实践的动态调适, 本质上是由于广电机构自身在媒体融合实践过程中尚未找到清晰的角色定位, 导致职业主播群体的角色调适充满着不确定性。组织管理层面的认知、理念、态度等复杂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播个体的调适转型实践。媒体深度融合进程下, 仍然存在部分广电媒体仍局限于传统广电媒体业务范围内, 并没有太多涉及新媒体领域, 抑或只是完成一种形式化的“姿态式融合”。而对于新媒体探索秉持鼓励、正面态度的媒体组织, 虽然赋予了主播一定的探索空间, 新闻主播的角色调适、转型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媒体组织的“摇摆”管理导向, 对实践边界缺乏明确规定, 主播新媒体探索缺乏足够的资

源保障,使得主播更多依靠个人去探索、试错。在这种情况下,面临机构角色定位与自身实践边界“双重迷思”的部分新闻主播,只能诉诸自我规约以避免触碰“红线”,要么放弃内容生产,要么固守角色转型,导致最终调适、转型效果不佳。

针对这一“双重迷思”困境,本文认为,广播电视媒体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强化职业新闻主播的“专业角色”属性和认同,这是推动媒体融合进程中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融合与媒体深度融合的关键所在。^[8]以往,专业逻辑处于被忽略的状态,从业者在不同角色逻辑之间的“认同摇摆”,时常面临角色冲突。实际上,“成名的想象”作为职业新闻从业者的内生驱动力,决定了其个体价值的实现必然需要更多诉诸“专业”逻辑。^[28]尤其伴随媒体融合发展战略不断深化,更加需要充分激活与发挥包括新闻主播在内的从业者群体的主观能动性 with 积极性。不过,仅仅强化“专业角色”这一实践逻辑,并不足以实现完全的调适、转型。融合传播时代的“融合”关键在于构建更加融通的传播机制,这就需要主播能够在新旧媒体的不同场域之间实现能动性转化。边界的摸索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每一位传统广电新闻主播谋求角色调适、职业转型的必然道路。而这种探索实践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媒体机构的适度放权。有研究发现,新闻媒体的融合创新是一个新技术遭遇制度、文化、实践、规范等诸多结构性因素阻碍的过程。^[29]本文访谈的部分主播,所在的广电媒体拒绝融入新媒体平台,而采取“姿态性融合”的媒体机构也未能给主播转型提供专业资源保障,仍然在固守传统媒体逻辑的前提下进行新媒体业务的拓展,距离突破性创新融合的主流媒体还很远。

媒体融合十年进程中,大多数媒体采取“边缘创新”方式,主要依靠媒介组织及其成员的实践行为。^[30]因此,本文最后也试图基于中观组织层面、微观个体层面就未来媒体融合提出相应建议。首先,在组织层面,媒体机构在鼓励新闻主播大胆“边缘创新”的同时,还可通过设置相应的激励机制,在运营、考核、机制上为主播的转型提供托举,推动规模相对过剩的传统新闻主播深度参与多元场景的业务实践(例如电商直播、内容营销等),实现渠道、内容、技术、经营与管理等领域的全面创新。其次,打造新媒体平台的个人IP(例如“主播说联播”)或是一条值得参考的路径:新闻主播群体需要在保持原有传统媒体职业角色定位的前提下,通过利用自身工作经验发挥专长,深耕某一特定垂类领域,在打破固有职业身份认知、实现新的媒介市场身份认同后,借助象征性资本在融合传播场域的能动性转化,以此来实现融合传播语境下媒体价值效应的整体增效。就目前的业界实践来看,传统广电主播转型的关键是要找准自身定位,利用既有的资源优势打造具有较高辨识度的个人品牌。最后,面对智能化、数字化浪潮冲击对于传统媒体角色的重新定义,新闻主播更加需要体认自身作为“人格化中介”的本位价值,进一步提升自身对于社会的观察力、敏锐度,强化语言表达、情绪感染、价值判断、观点输出等综合能力,打造新时代具有传统媒体底蕴的意见领袖,通过口语传播的“人格化界面”以适应智能传播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 [1] 彭兰. 数字新闻业中的人—机关系 [J]. 新闻界, 2022 (1): 5-14.
- [2] 梁眉佳, 张杰. 个体化视角下传统媒体主持人身份祛魅的研究 [J]. 当代电视, 2024 (1): 83-89.
- [3] 李彪, 赵睿. 传统媒体从业者职业转型意愿研究 [J]. 编辑之友, 2017 (6): 35-40.
- [4] 丁方舟. 创新、仪式、退却与反抗——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类型研究 [J]. 新闻记者, 2016 (4): 27-33.
- [5] 丁汉青, 苗勃. 网络时代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研究 [J]. 当代传播, 2018 (4): 19-23.
- [6] 王晓红, 俞逆思. 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J]. 新闻记者, 2019 (9): 51-60.
- [7] 朱江丽, 史玲莉. 媒体融合中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融合与工作满意度: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 [J]. 国际新闻界, 2021

- (7): 139-156.
- [8] Viererbl, B. & Koch, T. (2021). Once a journalist not always a journalis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job changes from journalism to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ism*, 22 (8): 1947-1963.
- [9] Zelizer, B. (2015). 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 journalism and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5 (5): 888-908.
- [10] 赵新宁. 用互联网思维留住传统媒体人才 [J]. 青年记者, 2014 (19): 60.
- [11] 张静. 传统媒体人转型态度的类型与特征研究——基于J广电的田野调查 [J]. 新闻与写作, 2023 (3): 92-102.
- [12] 何映霏, 李龙飞. 常规“脱嵌-再嵌入”: 媒介融合视域下新闻从业者的行动逻辑与职业认知 [J]. 传媒观察, 2022 (9): 26-33.
- [13] 常江. 身份重塑: 数字时代的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 [J]. 编辑之友, 2019 (4): 91-97.
- [14] 白红义. 边界、权威与合法性: 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8): 25-48.
- [15] 周勇, 郝君怡. 职能演进与群体变更: 播音主持职业发展演进逻辑与未来趋势 [J]. 当代传播, 2019 (5): 40-45.
- [16] 陈立敏. “跨越山河大海”? ——媒体人职业转换中的角色冲突与调适 [J]. 新闻记者, 2019 (7): 50-57.
- [17] 陈虹. 论节目主持人的角色误区及其对策 [J]. 新闻界, 2015 (3): 88-89.
- [18] 孙璐. 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持人的角色重构与传播策略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5 (4): 73-74.
- [19] 孟莉. 从大屏到小屏主持人角色转型与业务提升 [J]. 电视研究, 2021 (11): 106-108.
- [20] 马文华, 王长潇. 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转换与定位 [J]. 当代电视, 2013 (8): 101-103.
- [21] 丁韬文, 刘朝霞. 融媒时代主持人的自我坐标、身份认同与角色超越——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主持人大赛为例 [J]. 当代电视, 2020 (7): 97-100.
- [22] 李玉梅.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主持人与网络主播的角色融合与相互重塑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3 (4): 72-75.
- [23] 万江莉. 时政Vlog主持人的角色转型与创新 [J]. 新闻爱好者, 2023 (11): 111-112.
- [24] Corbin, J. & Strauss, A. (2014).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25] 张志安, 吴涛. “宣传者”与“监督者”的双重式微——中国新闻从业者媒介角色认知、变迁及影响因素 [J]. 国际新闻界, 2014 (6): 61-75.
- [26] [法] 布尔迪厄. 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 [M]. 褚思真, 刘晖,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69.
- [27] Liangen, Y. & Xiaoyan, L. (2014). A gesture of compliance: Media convergence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 (5): 561-577.
- [28] 陆晔, 潘忠党. 成名的想象: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J]. 新闻学研究, 2002 (4): 17-59.
- [29] 刘战伟, 刘蒙之. 新闻创新“失败”的比较研究 [J]. 全球传媒学刊, 2023 (4): 113-129.
- [30] 朱江丽, 左雯榕. 结构中的创新: 媒体融合创新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的扎根研究 [J]. 新闻记者, 2024 (3): 10-26.

[责任编辑: 华晓红]